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二九期 ——
(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302d)

【史料辨析】林彪与“五一八讲话”	佚名
【史海钩沉】红卫兵诗歌——虚拟战争的写照	王朝阳
【学术争鸣】文化革命中造反运动及造反派之评析 (二之二) ——为文革三十五周年而作	刘国凯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w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料辨析】

林彪与“五一八讲话”

• 佚 名 •

在几乎所有的批林文章中，都无一例外地把林彪在 66 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简称“五一八讲话”，列为批判的重点之一。理由有二：其一是，林彪在会上大谈政变问题，危言耸听。尤其是联系到后来社会上流传的“二月兵变”，似乎林彪是关于制造兵变问题的始作俑者。九一三后，人们也认为林彪阴谋政变，早已有前因，于是林彪政变之说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其二是，1972 年，在批林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布了毛泽东 1966 年 7 月给江青的一封信，信中毛明确表示了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一些提法的不安。即林彪所谈的政变问题和紧跟毛泽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也成了毛泽东洞察一切，早就怀疑林彪野心的理论根据。让人感到老人家真是明察秋毫，即使在用林彪时也对其有所怀疑，后来又给了林彪很多改过的机会，林彪不听毛的，终于走向历史的反面，咎由自取。似乎毛泽东却成了受害者，是个林彪被蒙蔽的伟大领袖。

今天看来，林彪当年的“五一八讲话”的确有很多错误的地方。但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应该放到三十多年前的环境中去全面观察。这个环境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脱离当时党内斗争的情况，国际，国内的具体环境及毛泽东本人当时的指导思想来批判林彪的“五一八

讲话”，是不客观的。

一，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的交锋

自1965年12月会议以后，在杭州，上海的毛泽东与在北京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周恩来在如何进行文化界的批判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尤以毛泽东与刘、彭的矛盾最为尖锐。周恩来说话谨慎，尽管周恩来不同意毛的一些做法，但历史的经验告诉周，他绝不能公开与毛唱反调。邓小平则尽量躲开是非之地。如66年3月军委批判罗瑞卿会议，邓小平在会议的当天就离开北京去西南三线考察。4月杭州批彭真会议，邓小平也没有出席。这样，等于在第一线与毛抗衡的主要是刘、彭。彭真作为中央常务副书记、中央秘书长是刘少奇处理党务的最主要副手。要打到刘少奇，必须先打到彭真，这点毛十分清楚。除此之外，在涉及国际共运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彭真也出现重大分歧。其一是，1966年1月关于中共是否派出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刘少奇、彭真、周恩来及以林彪为代表的军委都主张继续派代表团。因为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大会都邀请兄弟党参加，即使有分歧，也同样发邀请，这已成为惯例。刘、周等人认为分歧归分歧，毕竟中苏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况且，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五十年代苏联援助中国的大量工业设备及军事装备趋于老化，零部件极度匮乏。中国此时又面临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的威胁，缓和中苏关系非常重要。与苏联和好的呼吁在军方也十分强烈。但毛泽东已认定苏共是修正主义，坚决反对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况且此时，他已认为刘少奇等人要走的道路。一波未平，波澜又起。当年2月，中共与日共的关系又因毛泽东个人所为导致决裂。66年2月，日共代表团访华。在中苏论战期间，日共虽说保持中立，但基本上是倾向中共的。由于日共代表团为维护与苏共的关系，主张在两党的联合声明中不点名（苏联）地批判修正主义。对此，北京常委刘、周、邓等人决定：一。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二。尊重宫本显治的意见，在中日两党声明中不点苏联的名。然而，当彭真将常委意见通知毛泽东后，毛泽东大为光火：他们同意，我不同意。联合声明不发，代表团不派，原则问题不能做交易。最终，毛泽东个人否定了常委会的决定。中共与苏共、日共几乎同时断绝关系。这两起兄弟党关系问题愈发激起老人家要在国内展开大规模反修斗争的决心。从表面来看，这好像只是兄弟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究其实质，却是毛泽东极左思想在国际共运中的延伸。

66年2月，彭真的中央五人小组拿出关于文化革命的汇报提纲之后（这个提纲是经刘、周、邓同意的），彭真带着小组成员赴杭州向毛汇报。提纲的中心思想是将文化界的批判活动局限在一定的范围。此时，刘、彭向毛做出让步。（彭真同意批判吴晗）毛泽东也表现出十分的大度（毛同意彭真的意见，将批判局限在文化界），圈阅了提纲。以至于北京的常委都松了一口气。南北之争似乎可以以双方作出让步而告终。汇报提纲工作结束，彭真去外地视察。刘少奇也按计划去国外访问。（刘少奇原本因66年1月大病一场和与毛的争论，准备取消访问计划）。没有人会想到这实际是毛的缓兵之计。就在彭真等人起草汇报提纲时，江青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也在起草另一个历史性的文件。北京的常委都被蒙在鼓里。刘少奇出访后的第二天，毛泽东马上就推翻了自己原来的指示，开始指责彭真。并在极短的时间内，两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到了彭真。等刘回到杭州出席常委扩大会议时，摆在他面前的是彭真已被毛点名批判的既成事实。而且，周、邓也已默认。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彭、罗、陆、杨问题。（因为此时打到彭、陆仅在常委会上占了多数）。而刘少奇却坚持召开中央全会，解决问题，并讨论文革问题。毛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目的，就在于要将江青张春桥等人塞进会议，并提出所有出席会议者都有表决权。刘少奇认为党内重要人事变动必须经过中央全会通过。这也是刘少奇剩下的唯一能与毛泽东抗衡的办法。此举将把江青、张春桥、关峰、戚本禹等这些未来的文革干将摈之于全会的大门之外。而这些人都是毛泽东的马前卒。只剩下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全会中不足以形成多数。刘少奇对此是有把握的。这点与1957年6月苏共政治局要罢免赫鲁晓夫，而赫鲁晓夫却通过把政治局会议变成中央全会，一举扭转局面

有雷同之处。刘少奇深知，打到彭真，就等于打到他自己。这是他最后一搏。如果全会顺利召开，既能保全自己，又能挽救彭、陆。毕竟毛泽东的所为是不敢拿到全会的台面上来的。有迹象表明，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最初也是同意召开全会，而不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最后，邓小平放弃了与毛对抗的做法，改为支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大人何因在此时放弃了对刘少奇的支持不得而知。从以往的情况看，实际上，在思想上邓与毛更为接近；而刘、周、彭则有较多共同点。后来刘、邓在文革中迥然不同的境遇即可说明。由于主持书记处的总书记转而赞成毛泽东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安排，周恩来也默认，在北京的常委中，刘少奇已不能得到多数。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确定了四项内容：1，江青，张春桥等人正式走进中共高层，并组成以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隶属政治局常委会领导，实际上变相地取代了书记处的职能。2，毛泽东设想的文化大革命得以通过。“五一六通知”是以中央文件方式下发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基层组织。3，刘少奇的最主要支持者被合法打到：彭真（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及党务）、罗瑞卿（军队）、陆定一（文化宣传）、杨尚昆（中办）。4，陶铸、叶剑英进入政治局。（陶铸历来与刘少奇关系不睦，是毛的支持者）从后来的情况看，如果在五月召开全会，毛泽东未必稳操胜券。相反，刘少奇很可能通过合法的程序，限制毛泽东理想主义与诗人气质的结合物——文化大革命这一怪胎的出现。即使到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多数委员还是不同意批刘。以至于中央还要在9月和10月继续开工作会来贯彻毛的批刘方针。邓小平后来也被打到主要是因为在此期间反对批刘。

二，林彪“五一八讲话”的有关背景

政变问题是林彪五一八讲话的重要内容。那么林彪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讲话？国内背景：60年代初，中苏两党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导致了空前的公开大论战。这场导致国际共运分裂的论战，在今天看来，主要责任在中共，尤其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当时的激进派，其他如邓小平、彭真、康生等，均是毛与苏共论战的积极支持者。今天，如果我们再翻出当年中共的九评来看，恐怕没有一条能站住脚。而刘少奇、周恩来却持稳重态度。1960年10月，刘少奇访苏后，中苏关系迅速好转，是个难得的机会。（历史上，中苏两党关系最好的两个时期，一个是1954年到1956年；另一个就是短暂的1960年10月到1961年4月）然而，决心当国际共运老大的毛泽东又一次在61年4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起进攻的姿态，为恩维尔·霍查这个欧洲社会主义一盏十分昏暗的小灯泡和其惟我独尊领袖欲望，不惜与众多的给中国巨大帮助的社会主义国家翻脸。毛泽东的乌托邦意识形态在国际如此，在国内亦然。

自1965年1月，毛泽东决心从政治上打到刘少奇后，如何达到这一目的，老人家的确费尽心机。老人家此时能依靠的力量主要是军队。军队拥毛不假，但是否会反刘，毛并没有把握。为此才有65年9月到11月，毛频繁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毛首次公开号召地方包围中央，打到中央的修正主义。林彪的讲话中也提到，毛几个月来睡不好觉，在部署防止政变的事情。如果毛没有做这些，谅林彪此时也不敢信口开河。林彪当然不会提到，毛防止中央政变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38军调到保定，用做勤王。并指示：文革期间，不经军委主席批准，任何人不准调动一兵一卒。毛防的是谁？当然不是林彪。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恰恰是在38军部署完毕后召开的。同时，北京卫戍区也增加了两个师的警卫力量。毛内心惧怕刘少奇召开中央全会，不然在敏感时期调集部队到北京干什么？毛实在是做到了双管齐下。包括在必要时以武力解散刘少奇可能召集的没有毛泽东参加的中央全会。

国际背景：60年代中期，国际上政变频繁。主要来自一些刚独立不久的第三世界国家，其中有些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在此，只举几个突出的例子。非洲，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出访加纳，适逢加纳政变。与中国友好的恩克鲁玛总统险些遇刺。周恩来是在坦克、装甲车戒备森严的总统府与恩克鲁玛会面的。此事给中国领导人予强烈印象。1965年，阿尔及利亚布迈丁政变推翻了本·贝拉总统。阿尔及利亚是当时与中国最友好的非洲国家。在独立战

争期间，中国和捷克是仅有的两个向阿尔及利亚公开提供武器装备的国家。以至于独立后，阿尔及利亚政府把民族解放阵线总部对面的大楼给中国做大使馆用，理由是随时可以与中共联系。后来想要也要不回来了。

在此，特别要提起的是与中国和中共关系最密切的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1965年发生的九三〇事件。在中苏两党争论公开化后，印尼共产党坚决站在中共一边并在苏加诺的政府和军队中有巨大影响和实力。1963年至1965年中国与印尼的关系十分友好。印尼共产党领导人频繁访问中国。1965年9月30日，由印尼总统府警卫营长翁东中校（共产党人），带领部队发动政变。逮捕并枪决了亲美英的七人将领委员会中的六人，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逃亡。到10月1日，政变成功。印尼政府及海、空军和部份陆军均站在政变委员会一边。然而，恰恰漏掉了陆军战备司令部的苏哈托少将。短短的两天时间，苏哈托紧急调动可以使用的部队，又进行了反政变。在美英等国的支持下，苏哈托终于掌握了局势。印尼共产党及左派遭到前所未有的杀戮。苏共为此指责这是毛泽东冒险主义的巨大失败。九三〇事件对中共的打击是巨大的，中共在东南亚最大的盟友从此不复存在。艾地（印尼共产党总书记）之死，对毛泽东本人也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以后关于反革命政变成功，就要有千百万人头落地的说法，与此不无关系（印尼共产党及亲共人士前后被杀达四十万之多）。这一杀戮从65年10月持续到67年苏加诺最后交权给苏哈托。也就是说在林彪“五一八讲话”之时，印尼对共产党的屠杀仍在进行。

最后再看看老大哥苏联。1957年6月，苏共政治局多数要罢免总书记赫鲁晓夫。发起人是在思想上与毛有共同之处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这些都是斯大林时期的老近卫军。在维护斯大林主义上毛泽东与他们有着共同点。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政变前一个月，即1957年5月，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时，中共给予他的接待规格是空前的。远超过赫鲁晓夫的接待规格。然而，在朱可夫的帮助下，赫鲁晓夫成功地把政治局的少数变成了中央全会的多数。赫鲁晓夫取得了胜利。

1964年10月，苏共再次发生不流血的政变。赫鲁晓夫被赶下台。老大哥七年中的两次政变毛泽东记忆犹新。当然，毛泽东不会认为林彪可能成为57年的朱可夫。但老人家会不会防止贺龙、罗瑞卿成为57年的朱可夫呢？从65年12月会议后，贺龙、罗瑞卿同时被解除兵权来看，老人家可能正是这样考虑的。

由此可见，在文革初期，真正考虑防止政变的首先是毛泽东。林彪的讲话无疑是毛泽东思想的体现。而不是林彪自己的发明。早在1964年2月，毛泽东在与金日成会见时，就对金说：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不是假设，是很有可能出现的。彭德怀要是象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国家的权力，今天，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我们可能会象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的处境一样。这些人（指彭德怀和赫鲁晓夫）总是想复辟，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从1966年1月至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这段时期，可以说是政局最为扑朔迷离的时期。毛泽东认为他正在进行一场反复辟的斗争。“五一六通知”的发出是毛泽东一个巨大胜利。刘少奇垮台就是个时间问题了。

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主角是谁？

由于林彪关于政变的讲话，加上林彪很快在8月的十一中全会上取代刘少奇这一事实，似乎林彪就是五月会议的主角。其实不然。五月会议的主持人是刘少奇，他在主持打倒自己的会议。自1965年11月至1966年5月，中共实际上形成了两个中央。一个在上海，它是毛泽东的临时中央，另一个在北京，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央。康生的作用在于毛泽东所有重大指示都是由康生代表毛到北京传达。五月会议的真正主角是康生、陈伯达、张春桥、江青和幕后的毛泽东。

林彪是在会议召开十几天后才讲话，讲了几个小时。康生则讲了一天。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是在“五一六通知”形成通过之后。这点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没有“五一六通知”的形成，林彪的讲话也可能不是这个样子。从历史上看，林彪从来是紧跟毛泽东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也许林彪本人当时也是不理解的。他是在表明自己的真实心态，还是在告诫其他与他有同样看法的同僚们？可能二者兼而有之。

我们从林彪最初对江青关于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的态度也可窥见端倪。

林彪与江青（代表毛）对建国17年的文艺界评价是截然不同的。林彪认为方向路线的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只是水平质量问题。而江青（即毛泽东）却认为是修正主义路线问题。林彪并未委托江青开什么座谈会，是江青秉承毛的旨意上门找林彪。为此，林、江二人还有一段十分不愉快的谈话。林彪不看僧面看佛面，让叶群通知总政派人（刘志坚等人）到上海参加江青的座谈会，叶群让他们带的资料却是研究三大战役的文艺创作。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个纪要要是纲领性的文件，与之对立的是彭真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林彪原本住在苏州，后为躲避江青的纠缠，搬到了他很少去的济南。

林彪最后同意已军委的名义下发此件是迫不得已。其一，江青明确告诉林彪，此件毛审阅了三次，最后毛定稿。其二，林彪在通知北京军委其他成员时，特意强调这是毛审阅三次，并做了修改。林让军委成员讨论并拿出意见。林此举无疑是告诉军委成员，这既不是林彪的意见，也不是江青的东东，而是老毛的大作，你们自己看着办，我林彪是无能为力的。军委全体通过。在文件下发时，毛泽东为了给自己也给江青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亲笔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这关键性的几个字。“为要打鬼，借助钟馗”，这是毛泽东给江青信中说的。但究竟是谁借谁呢？

四，林彪是不是接班人？

把林彪通过“五一八讲话”归为林、江勾结，打到刘少奇，过于牵强。在整个毛刘斗争的最激烈时期，即1965年12月至1966年8月，林彪除了有“五一八讲话”，基本上置身于斗争之外，尽管他是常委之一。就连后来8月要选举他为第二号人物的十一中全会，林彪也没参加。直到8月6日，毛泽东最后要和刘少奇公开摊牌，在数次电召林彪回京均被林彪以身体不好回绝后，毛急派徐业夫乘专机到大连，请林彪务必连夜来京出席会议。林彪才迫不得已前来。无奈的林彪恼怒地把毛泽东让他出任第二号人物的纸条撕个粉碎。一心想置身事外的林彪最终还是被绑在了毛泽东的战车上。事情的发展已经由不得林彪了。除非他与毛公开撕破脸。

第二号人物是不是接班人？由于林彪在十一中全会最后临时增加的选举议程上（原本议程没有此项内容，是毛在会议结束前临时要求的）被排在第二，取代刘少奇，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接班人的更替。其实，不管从那个角度来看，这只是毛泽东的权宜之计。因为，老人家此时太需要借助林彪的力量了。即便后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写入党章，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党章是可以修改的么。林彪这个二号人物不可能成为接班人的原因，除了其自身的原因外，还有几点要补充。

1，毛泽东从未谈起过林彪接班的问题。毛泽东在与国外领导人谈论中共高级领导时，曾有过两次较为详细的对中共其他领导的评论。一次是与赫鲁晓夫。当赫鲁晓夫问起中共领导人的情况时，唯一得到最高评价的是邓小平。毛对赫鲁晓夫说：你要注意那个小个子（指邓小平），此人前途无量。毛泽东在与蒙哥马利谈话时，却是另一番说法：毛后是刘，刘后是周，周以后的事他（指毛）管不着。毛、刘、周均为同时代人，其实根本谈不上什么接班不接班的问题。而且谁先死，谁后死，只有天知道。毛在两次谈话中没有提到林彪。

2，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共高级领导做过份析，并预测毛后的接班人，结论是邓小平。

3，在中共高级领导中，陶铸是与林彪交往很深的。如果说聂荣臻是对红军时期的林彪了解最透的，那么，陶铸无疑是对45年以后的林彪了解最透的。林、陶的关系非同寻常。但陶铸却在公开场合这样说：如果推荐毛主席的接班人，我第一个赞成邓小平。陶铸根本没有提过林彪。陶铸是了解林彪的。

4，周恩来在十一中全会前，曾与王稼祥谈话，提到毛泽东的接班人问题。周说：毛主席的接班人可能是林元帅或邓总书记。

1966年8月的十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得满票的是四人，排名：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后来公布名单前，毛将陶铸、陈伯达放在了邓小平前面。当全会选举林彪为二号人物后，林彪在全会上的一番讲话是很耐人寻味的：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除了林彪，在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中，恐怕没有几人能说出这样的肺腑之言。用诚惶诚恐来形容此时的林彪并非夸张。高处不胜寒。林彪最后的错误就在于他本人所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

## 【史海钩沉】

### 红卫兵诗歌——虚拟战争的写照

• 王朝阳 •

#### 一、时代背景：军事化社会

1949年，战争列车并没有立即停顿。人们从列车中下来，但是惯性依然存在，把一个战争的社会转化为一个经济的社会，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么，“文革”是中国转入经济社会所必经的阶段，还是历史突起的一个肿瘤？它是中国历史可以避免的，还是从根本上就无法回避？它是一次个人的选择，还是集体无意识的集中爆发？

对于中国来说，打败日本、打败蒋介石乃至抗美援朝的胜利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战争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灾难，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战争也树立了一个民族的自信心。战争空前地动员了一个民族的力量，战争带给我们从未有过的希望。对于战争，我们是礼赞和歌颂的，所以尽管在进入城市后，国家目标已经调整为建设一个新国家，但事实上，在身体上换装并不意味着在心理上换装。解放后一系列的电影和文艺作品，实际上是对人心的暗示和引导，特别是对出生不久的一代。可以说，解放后的一代甚至不止一代人的心理结构都是以战争和重大历史事件构成的。

那么，进入新社会的中国，谁打仗，与谁打仗？福柯曾有这样的疑问：我很吃惊，除了马

克思，至少是大部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教科书在关于阶级斗争时，都没有接触到斗争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大概除去托洛茨基的言论）。在这里，斗争意味着什么？是辩证法的对立吗？是相对于权利的政治斗争吗？是战争吗？在进行着阶级斗争的市民社会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以别的手段进行着的战争吗？

在进行着的阶级斗争的中国社会，不正是以别的手段进行着的战争吗？

如果追溯一下解放初期的一些活动和斗争，都不难发现带有战争的某种痕迹，几乎动员了社会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是以运动的形式出现的，运动中的暴力倾向比较严重。

1953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谈到高饶问题时，这样讲：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阴风阴火刮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

关于庐山会议，毛泽东在一篇《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短文中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斗争从一开始就被命名为两个“司令部”，又是机关枪又是迫击炮，权力的印记带有军事编号的性质，因而也就无法调和。治大国已经不像烹小鲜那么简单，治理国家已经变成你死我活的战争。

1966年的8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如果分析一下该日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完备的战争文本，它是一封战前的檄文，是一封战书。

在这个文本中，有战前形势分析（“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和“主流和曲折”），有战前动员（“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以及“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有明确的战斗目标（“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有采用战术的手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有战斗集团（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有最高司令：毛泽东。

然而战争是不存在的，这本来是一场“文化革命”，它应该是平和的。但革命两个字已经失去所有弹性和水份，革命只意味着你死我活，意味着战争的来临。

## 二、情景设计：虚拟战争

由中央发出的信号很快就在民间得到了回应。在一个集体意味浓重的国家里，战争动员显得特别简单和快捷。因为意识形态并不存在大的分歧，所以人们很快能团结在一起。成为战争对象的，实际上只是一群落伍者，他们并非不想赶上队伍，只是由于他们转弯太迟，才落到了后头。

人们开始自觉地进入角色，使自己成为一个战士。关于英雄的神话本来就是战争最需要的模本，这时候，模仿的人前仆后继，唱着歌在想象中把自己置于炮火之中——

## 《战士的话》

我是一个青年学生，一个普通的红卫兵  
不！我是一发穿甲弹时刻在炮膛里执勤！  
我的誓言在心坎  
我的仇恨在笔尖  
我的阵地在前站  
我的编制在尖刀班！

青春的亢奋和建功立业的焦虑这时候都化作对战争的热爱。对于一个刚从战争中解放的民族来说，战争不是残酷杀戮，不是生命的浪费，而是英雄们成长的最好土壤。战争前所未有地动员了一个民族所有的激情和斗志，同时也使这个民族对和平产生了忧虑，人们恐惧在和平中丧失激情，在安逸中消失斗志。

但是，只在内部产生一个对立的司令部是不能够激发一场战争的，仅仅靠内部的仇恨并不能聚集战争爆发所需要的能量，只有当“内忧外患”一齐袭来时，战争才是不可避免的。

显然，“国际”形势的复杂，特别是中苏关系的恶化，使得这场虚拟化的战争有了一个仿真的环境。事实上，这样的评估带有“自我恐吓”的性质，就像一个人走在黑暗的旷野里，他本来希望通过大声说话来驱走恐惧感，但是旷野中传来自己的回声，更加剧了自己对黑暗的惊惧。文化革命对国内国际环境作了不真实的，富有想像力的评价，也就把自己放到了黑暗的旷野里。人们把自己置于一个广大的逼真的战争状态下，逼迫自己再一次拿起武器战斗。

冲突永远是不可避免的，是存在于一切社会系统的，但冲突并不意味着要引发战争。冲突往往可能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可能成为社会发展，解决问题的动力。相反，没有公开冲突的社会绝不是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一个社会表面上没有冲突可能意味着冲突被压制和掩盖了，而这恰恰是火山爆发的前兆，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分歧公开地表现为冲突是一个社会团体关系正常、具有活力的迹象，这说明，可能爆发的火山在通过某些渠道把它巨大的能量缓慢地释放了。

1959年，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发生了一次冲突，而且双方都动了感情。1959年9月1日，毛泽东给《诗刊》编辑室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并寄上《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毛泽东在信中说：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他又说：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信念之争，甚至不是信念，只是见解的不同，已经完全情绪化了。中国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政治上非常成熟的国家，它缺乏化解冲突的制度性手段，所以政治中个人因素常常压倒集体意见。感情在政治中的比重过大，也就为政治冲突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当大家都在一种事业中投入了巨大的感情，当团体中的成员关系越来越密切时，不同的意见可能带来的不仅是对事业的伤害，而且是感情的破裂。但越是自己人，冲突就越尖锐，因为，大家都将冲突看做超越个人目的和利益的。毛泽东和彭德怀，毛泽东和刘少奇，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斗争的，也没有人认为他们是自私的，他们是战友，他们都为国家和民族献出了自己的亲人，但是，他们最后却走向了不同的命运。



“王八蛋”！这不是事业的冲突能骂出来的。

社会学家科塞说：“在一个没有充份具备对冲突给予宽容和使之制度化的社会里，冲突总是趋同为负功能。那些威胁到要撕裂社会，攻击一个社会系统中共同基础的冲突的剧烈性，是与社会僵化相关联的。威胁到一个结构平衡的不是冲突本身，而是僵化。僵化使得敌对情绪积累，以致一旦爆发，只能走上一条分裂的道路。”

### 三、情感喷涌：爱与恨泛滥

江青是对一个宏大事业的嘲弄。因为她是超越了理想的，是与美好无关的。但恰恰是这样的女人，钻进了理想大厦的核心部位，对一个伟人的评价因此变得复杂起来。

这个女人是以英雄的形像出现在英雄们的行列之中的——

#### 《献给披荆斩棘的人》（散文诗）

你是无产阶级永远出鞘的宝剑，你是二十世纪划破云空的闪电，你是啊，文化大革命红色暴风雨中矫健的海燕……敬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无产阶级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女政治家、女英雄，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

.....

敬爱的江青同志，你立下伟大的功勋，是因为你是个顶天立地的人。立地，是你能和广大革命群众红心相通；顶天，是你跟着毛主席跟得最紧，你哪句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春雷阵阵？你哪一步，不踏在毛主席指引的航程？你是毛主席亲密的战友，你又是毛主席忠实的学生。三十几年来，你高举的那杆红旗，掠过延水，挺进北京，冲上舞台，杀向敌营，所向披靡，百战百胜，不正因为这杆红旗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用红太阳的光焰燃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世界革命人民遥望中国那红色的大地上，烈焰腾腾。火焰中，大旗下，那个飒爽的英姿，不就是你啊，敬爱的江青！歌颂你，就是歌颂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歌颂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又怎能不仰望你啊，敬爱的江青同志！

对江青的这种赞美在今天看来是可耻的、赤裸裸的，不可思议的。它使用了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把一个女人推到了历史的最高顶点，因而充满着谎言和不真实。问题的关键当然不仅在于作者把它写出来了，更在于佚名隐匿的大批群众为什么能看着它出台并接受它，除了别有用心还有什么？

这就是江青。她已经被虚拟为战争中的旗手形像。她是坚定的，刚毅的，她是不倒的，文学词汇已经把她抽象为所有时代英雄女性的代表，文学魔术般地给一个丑陋的女人涂上了梦幻一般的色彩，使得一个心计深沉的女人变得高大起来。文学为自己创造的形像喝彩，倾倒。崇拜也许是真心实意的，歌颂可能是发自内心的，人们被自己感动了。

但是，倘若抽掉关于战争的词汇，抽掉乌云密布，大渡桥横，江青的形像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在设计了领袖和旗手之后，士兵的形像也开始被设计出来。一切都是战争化的，仿佛电影中黑暗世界的地下英雄——

## 《印传单》

压过去！压过去！压过去！ 拿起滚子，用足力气，刻下仇恨，印下战斗的痕迹。  
啊，革命的压路机，你开辟！开辟！开辟！开出条条大路，通向最后的胜利！

考虑到战争的艰苦和残酷，坐牢和砍头是在意料之中的事，自己的烈士形像被虚拟出来了

## 《放开我，妈妈！》

面对着两条路线生死决战，妈妈拉住我，不让我到学校去，怕我被走资派暗害。我对她说：  
放开我，妈妈！

别为孩子担惊受怕。

到处都是我们的战友，暴徒的长矛算得了啥！我绝不作绕梁呢喃的乳燕，终是徘徊在屋檐下；我要作搏击长空的雄鹰，去迎接疾风暴雨的冲刷！

放开我，妈妈！难道你忘了英雄的爸爸，为了祖国的解放和胜利，二十年前，他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

人民政权的奠基石啊，洒满了革命先烈的血花。

而今天，在两个阶级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哥哥又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在殷红的血泊中冲杀……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年轻的生命，迸发出万丈光华！想一想吧，妈妈！活着的人应该干些啥？

难道烈士的鲜血应该白流，难道眼看革命战友遭屠杀？难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不去捍卫，难道能让资产阶级重新统治我们的国家？

造反派从来不会向阶级敌人低头，顶天立地的英雄从来不怕镇压和屠杀！我走了，妈妈！

请你再一次告诉隔壁受蒙蔽的那一家，叫他们别再为阶级敌人卖命，跳出罪恶的泥坑，我们还是欢迎他！

挑动武斗的一小撮坏头头，一定逃不脱历史的惩罚！敌人的疯狂，不过是灭亡前的垂死挣扎。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杀不绝，压不垮！再见了，妈妈！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命令我立即出发！

阶级斗争的疆场任我驰骋，庭院怎能横枪跃马？等着我们胜利的捷报吧，妈妈！总有一天，我们会欢聚在红旗下。

为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儿誓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有点神经质的紧张，有点虚张声势的夸饰，但正是这种紧张和夸饰逐渐使人们从化妆状态中解放出来。最初可能是对上一辈英雄的模仿，随后就演变为一种自觉自为的行动，人们真的以为周围充满了敌人。从某种程度讲，文化大革命在社会心理上是一个由妄想狂和迫害狂共同参与的运动。但这种运动的最初可能并不是恶意的，它也许只是一种忧虑。对国内国际敌对势力的过份夸大，使整个社会陷入一种忧虑和不安之中，人们始终相信，自己所处的社会正处于一种危机之中，不安全感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人们忧虑国家的命运，忧虑社会的未来，人们为社会的前途处境感到不安。广播上尖利的嘶叫声，报纸、黑板报上又黑又粗的字体，接二连三被揪出的异己分子，这时候产生了巫术般的效果，它解决了整个社会对战争社会的心理障碍，这一切使人们相信：我们正处于被迫害之中。

有意无意之中，50年代60年代的战争电影、文学作品起了教导作用，红卫兵的革命想象力大多是从这些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来的。青年人的想像力很容易把自己定格于国民党反动派

黑暗统治的某个场景之中，他们在这种场景中受虐，而受虐又激发起他们无穷的斗志和干劲。他们印传单，受拷打，他们在战斗中献身，他们也在这场文化革命中“完美”了自己。早年的文学作品和电影，渲染了革命的钢性和战争激情，那些少量的有一点儿生活情调的作品却受到冷遇和批判，这实际上也就抛弃了软化心灵的药剂，整个社会的心灵是暴烈的，对人的残酷历史性地潜伏在我们的血液之中，对敌人那就更谈不上人道了——

### 《刘少奇算老几》

刘少奇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把你的脑壳当球踢！  
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 《子字歌》——“刘克思”的自画像

地主阶级的儿子，资产阶级的孝子。拜孔夫子，捧赫秃子。搂着柯西金的脖子，拉着苏加诺的膀子。人民面前他称老子，敌人面前他是耗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头子，中国修正主义的祸根子。左手拿斧子，专砍革命的苗子。右手提篮子，专摘革命的果子。打着白旗子，掖着大棒子。揣着金鞋拔子、银镏子，带着狐羔子、狗崽子。托着刘家的祖宗牌子，领着王家的老丈人、大舅子、小姨子。带着《修养》的黑本子，给革命者戴上手铐子。夺革命的枪杆子，抢人民的印把子。

毛泽东思想是宝镜子，照清了这魔鬼的丑样子。亿万人高举批判的大旗子，挖掉这修正主义的毒瘤子。扯下他的金牌子，打倒这个大骗子。给他挂上千斤锁链子，叫他永远不得翻身、千辈子！万辈子！

一种仇恨，一种咬牙切齿的仇恨，一种似乎聚集了整个社会的仇恨，没有丝毫调和的余地。

我们今天当然很难理解这种弥漫整个社会的情绪。一个组织对一个人的不满，或者一个领导者对另一个领导者的不满，怎么可能传达到社会的每一个人，使社会的每一个人都产生相同的情绪，这种类似某种病源的东西是怎么复制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之中去的？

实际上，把他虚拟成我们战争中的一个假想敌人就可以了。我们不能认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普通的生命，我们面对的是与我们同处战争状态下的另一方，一个敌人，一个时时刻刻威胁我们生命安全的异己分子，我们是站在不同路线的两方，对方这时已经被抽象为一个沾满毒汁的“走狗”和“卖国贼”，某个主义的代表。我们并非不讲人情，并非不讲人道，但我们的人情、人道是讲给阶级兄弟的，不是讲给叛国者的。当我们面对某个主义、某个路线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鞭挞是不带痛感的，我们在作践一个腐朽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不应该拥有生命的，是不应该存活于这个世界的，它应该受到惩罚。

□ 原载《粤海风》文化批评杂志2002年第四期

~~~~~

【学术争鸣】

文化革命中造反运动及造反派之评析（二之二）
——为文革三十五周年而作

• 刘国凯 •

四，宏观分析之二：单位内文革与社会上文革的关系与区别

（一）单位内文革与社会上文革性质上的差异

毛搞文革系旨在清洗威胁其绝对权威的刘势力。其手法是发动群众对刘势力进行冲击。在声誉上把他们搞臭，再以非规范手段褫夺其权力，并在重建权力系统时把他们排除在外，从而达到把他们逐出权力圈的目的。

这里很自然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哪一级干部有可能属于刘势力？换言之，毛心目中政治清洗的范围有多大。如果说在1967年“一月革命”时人们对此还不甚了了的话，那么到了1967年中以后就可以明显看出，有可能被毛划为刘司令部里的人而予以打倒的只是省级顶多再延至省会级领导干部。

但是，文革时期被群众冲击的远不止这些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凡是一个单位的主要领导人，哪怕他的级别只有20级，也一样作为当权派受到群众的“揭发批判”。显然，这大量的中低级领导干部绝对不是毛的政治清洗对象。然而在1966年11月至1967年夏这半年多如火如荼的日子里，毛仍然放手让群众去冲击他们，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有三：

1）如果由毛直接点名来将一批包括刘邓在内的高干逐出权力圈，这种做法莫说在党内高层难获通过，即便能通过毛也不予采纳。因为毛是要把自己的政治清洗涂上反修防修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神圣油彩。他决不愿人们认为他是在搞斯大林那种清除异己的残酷斗争。故从他发动一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对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批判。

2）如果批判的范围只限制在高级干部中，那就真的只是思想批判了，达不到把他们逐出权力圈的目的。因为只要原有权力系统未予打破，他心目中的那些清洗对象就可以利用其手中的权力网络来对清洗作软性化解。只有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针对所有当权派的群众运动，暂时撕破原有的权力网络，才能使那些清洗对象无以遁形。

3）毛泽东是个思想充满混乱矛盾的人物。他经常要作些扯着自己头发离开地面的事情。他明明是共产党官僚系统的总代表，但又要以人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去批判指责官僚主义。他实际上也意识到中、基层领导干部的官僚作风已在群众中引起了相当大的不满。他认为在这场运动中让他们喝两口水也不要紧，反正稍迟会给回他们抚慰。而允许群众对他们进行一些批判，大可以使群众对自己感恩戴德，更心甘情愿地为自己效力。

藉此，我们可以明了：对中共领导干部而言，社会上的文革性质是政治清洗，而单位内部的文革性质是政治陪斩。说得更清楚些是，省市级中共高级干部中的某些人是毛的清洗对象，而为数众多的各单位里的领导干部，只是为了使毛的这场政治清洗运动做得更冠冕堂皇些而被拖上了政治陪斩台。

（二）单位内群众组织成员的相对固定性和社会上的相对流动性

工厂机关中自发群众组织的产生远比学生要迟。一般在1966年11月6号毛中央“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下达后，群众才敢有大动作。因为这个文件才明确讲明，给在1966年夏“资反线”中（第二次反右运动）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平反和销毁有关档案材料的规定不限于军队院校，而且适用于所有工矿企业机关事业单

位。这个文件的下达，再加上平民红卫兵到工厂机关中的串连活动才使工厂机关里的群众组织迅速成立。

这些组织的成立一开始就带有明确的界线——与单位当权派的亲疏远近。当权派的亲信红人们、次亲信红人们很自然地逐渐汇聚在一起成立起一个或若干个组织。这类组织并会逐渐形成联合体。与当权派不睦甚至有牙齿印的人们也在形成另一类聚合。

有一种看法是：亲当权派的组织都是出身成份好的，反之则是差的。这种看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不能绝对化。因为与当权派的亲恶并不完全决定于出身成份。从道理上来讲，文革前表面上还在说：“讲成份，但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从实际上来看，基层单位的领导需要有业务熟悉，听话服从的人为他作工作，这两个因素的迭加就使各单位中都会有一定数量出身一般甚至差的人成了单位当权派的红人或次红人。这种情况的反面就是某些出身成份红的人由于种种原因——性情耿直不满领导的跋扈作风或不忿自己拥有红牌子却未分到应有的官职、得到应有的待遇而与当权派交恶。故此，在亲当权派的群众组织中依然会有出身成份较差的人，当然他们一般不会做这些组织的领导。在反当权派的群众组织中则有出身成份红的人，而他们大多就会成为这类群众组织的领导或骨干。

正如毛所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或恨。人们亲或恨当权派归根结底系主要来源于实际利益分配的不同，而这“分配”权握在当权派手中。但是，世事是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会简单地停留在个人与当权派的关系上，它还会扩展到其它关系上，比如扩展到中层领导干部和一般群众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对“当权派”实际上还可赋予更广义的涵意，那就是人格化的权力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基于对虚名和实利的争夺，基于对正当权益的维护和对超常利益的攫取，两个群体的人们之间会出现一条无形的界线乃至鸿沟。一个群体是感到自己在这个权力体系中得到好处利益（得了甜头的）而心情畅快的。另一个群体是感到自己在这个权力体系中受到排斥、利益受到损伤（吃了苦头）而心情压抑愤懑的。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互相戒备、猜忌乃至仇视，往往与当权派都不具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在中大型的工厂单位中，一般群众与单位领导并无直接冲突。权力体系对他们的损害往往具体表现于不算当权派的中层干部的行为作风上。而在多数情况下中层干部控制的群众组织是亲当权派的。于是，“苦头派”群众组织就顺理成章地去反当权派。

基于这一剖析，就可以对有些反常情况得到合理的解释。比如有些单位里的“苦头派”竟然保当权派。而“甜头派”却反当权派。深入调查一下，可能发现是这样的情况：那当权派是新调来的。因某些缘故他与单位里原有的中层干部没有搞好关系，遂遭到他们的反对。倘若“苦头派”正是恨这些中层干部的话，那就会去保那个当权派。然而，从本质上去考察，绝不会因此改变了在这较特殊的情况下保当权派的“苦头派”群众组织的造反派性质。

由此可以明了，文化革命中各单位内的“甜头派”和“苦头派”各自的组成都是相对稳定的。这是基于文革前许多年政治制度、经济秩序的沉淀并加上了文革中的强固剂所至。

单位内的组织由各个个体的人组成。社会上跨单位、跨行业、跨地区的群众组织则由各单位的组织集体加入而成。这是因为单位内的群众组织通常都希望加入社会上的组织联合体，以得到外部的支持。在通常情况下，社会上的大造反派组织由各基层单位的“苦头派”组成。大保权派组织由各基层单位的“甜头派”组成，但例外和变动是相当多、相当大的。

“苦头派”跑到社会上加盟到保权派之中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发生这种错位现象大多是因为该“苦头派”组织成立得早。那时社会上的造反派联合体尚未出现，而保权派联合体亦未充分显露其保权特质，它就阴差阳错地加入到保权派之中。不过，此后它们大多会纠正自己的坐

标。

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上柴联司”。从它的成员情况来看，它无疑是个“苦头派”。但厂里的“甜头派”比它早一步加入了“工总司”，那时社会上大组织的造保分野还不甚清晰，于是它转而投到赤卫队之中。

如果说“苦头派”加入到社会上的保字号组织还比较少见，那么“甜头派”在社会上加入造反派联合体则是相当常见的现象。这大多出现在造反派较为得势的时期。而在造反派失势时他们就会退出乃至“反戈一击”。到造反派再度得势和失势时它们就一再表演这种加入退出的卑劣戏目。这就造成社会上群众组织成员的明显流动性。

单位内的“甜头派”对“苦头派”是绝对排斥势不两立的。但对社会上的造反派观点却可以接受，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社会上的文革性质是政治清洗，单位内的文革性质是政治陪斩。

当“甜头派”的人们明白毛要清洗一批刘系高干后，他们不会有丝毫的抵触，因为毛要清洗哪些中共高官于他们的实际利益毫无损伤。而且为了表现他们是忠于毛的，只要毛中央明确点名哪几位省市高官是刘司令部里的人，他们也会跳起一丈多高去造这些省市高官的反。但对本单位的领导他们就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因为本单位领导人的倒台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地位和利益。如果让“苦头派”的人们得以拥有了发言权，他们的优越地位和利益更为堪虑。他们曾有短暂的惶惶。但从1967年2—3月军方对社会上造反派的镇压中，已悟出一些奥妙。至1967年夏，他们已彻底明白，中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不在政治清洗的范围之内。除非查出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中基层领导干部在接受一段群众运动的冲击后都会官复原职。于是，他们遂完全放胆保本单位的领导。更有甚者争相对半“打倒”的领导干部输诚表忠，以期不久他重掌大权后给自己以提携和奖赏。

（三）单位内造反动机的简单性和社会上造反动机的复杂性

单位内的造反派必定是“苦头派”，这决定了单位内的造反是最具真实的造反意义。是文革期间最广泛的造反行动。是民众对文革前十七年共产党政权所施于的政治压迫和文革初期“资反线”（第二次反右）迫害群众的反感的总爆发。

单位内部，每个人之间都是熟悉的，彼此都了解底细。张三为什么会造反，李四为什么会“保皇”大家心中都有数。因为动机是那么的清晰和简单：绝大多数为反抗类造反，加上少数王洪文类造反。

在运动发展到1967年中以后，反抗类造反的人们发现受过他们批判的单位领导笃定会官复原职时，深深预感到“秋后算账”的威胁。其中一部份人灰心丧气，另一些人则全力投入争取单位内革命委员会名额的斗争。希企通过争到一些名额权力来增加自己今后的安全系数。

社会上的造反动机囊括了除贵族红卫兵类造反之外的8个类别。

聂元梓们在进行其政治赌博。王洪文们在实施其政治投机。平民红卫兵在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受过政治歧视、政治迫害的人们在讨回公道、在发泄愤懑。张九龙们在密谋着他们的悲壮计划。杨曦光们在追求着崇高的政治理想。争权者在为填补政治权力出现的空白而缠斗角力。

所有这一切迭加起来就形成了社会上五光十色的造反动机。其中有沙子也有璞玉，有灰暗的阴影也有灿烂耀眼的光辉。因而比单位内的情形要复杂得多。

（四）单位内造反动作的温和性和社会上造反动作的激烈性

无论是工人或职员，他们在本单位内的造反动作大多是比较温和的。较少有象学生那样冲进党委或其它政治要害部门打烂档案柜抢夺“黑材料”的行动。对待本单位当权派也相当讲分寸。在批判、批斗会上很少使用暴力。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工人职员都是成年人，不具青少年特有的暴力倾向。而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本乡本土的，做事总得顾忌后果。口诛笔伐留下的痕迹有限，而暴力伤及身体将会留下永久的记忆和仇恨。在局势尚为混沌的1967年初以前，工人职员造反派在单位里尚且不敢胡来。遑论1967年中以后毛已表明会让绝大多数的中基层领导干部官复原职了。

此外，还有个原因是大多数单位里都有保单位领导的“甜头派”与之抗衡。有的单位“甜头派”力量还非常强大，远远超过造反派。造反派批判当权派的动作若有过火，他们甚至会去冲击会场。

在单位当权派中只有一种人是最为悲惨的，那就是被查出确有政历问题者。（隐瞒了出身成份，有投降变节行为，历史上任过国民党军政职务等等）这样的当权派无人会保。“甜头派”非但会把他抛弃，还会翻脸无情地对他进行批斗。在单位里两派的双重打击下，这些不幸的人们陷入了十八层地狱。

社会上对省市高官的批斗行动比单位里的激烈。这是因为社会上的造反由青少年学生主导。尽管平民红卫兵远不象贵族红卫兵那样凶残暴戾。但批斗会上挂重牌、揪头发、喷气式、九十度还是出现了。尤其是对毛中央定案了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如彭罗陆杨等。工人职员造反者由于在社会上离开了本乡本土，没有顾忌，也会有些品质较差的人做出粗暴的动作。

但应予以指出的是，文革中激烈的暴力行动并不存在于对当权派的批判行动中，而存在于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由于省市高官与基层民众没有直接关系，也即他们与批判他们的群众并没有直接仇恨，所以在有些场合，批判也只是走过场而已。而基于多方面原因所形成的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才真正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关于这些，由于已超出本文议题，须另作探讨了。

五、宏观分析之三：省级文革的四种模式

文革在全国各地无一例外地发生，其基本形态、基本过程是大致相同的。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各地造反运动中九个类别的不同组成比率，毛中央对该地区介入的迟早和深度，该地原省市高官的派系情况以及军队派系情况等等，使各省的文革形势有一定的区别。

应该说文革是以省为单位的。一省之内的文革形态相当一致。文革中，群众组织最大的规模是省级。不能有全国性的组织。1966年底成立了几个全国性的组织，1967年初便被取缔镇压。1968年7月南方几个省的造反派组织商量成立联络机构，立即遭到毛中央的严厉训斥和禁止。

这里有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每一级的群众组织其矛头可指向同级党组织。如，县级群众组织造县委的反，省级群众组织造省委的反。以此类推，全国级的群众组织就应去造中央的反。但这怎么可以允许？故毛中央决不允许全国级群众组织出现。至于批判揪斗刘少奇等中央级高官，可由北京造反派承担，无须因此组建全国级群众组织。

虽然各省文革形势有一定区别，但总不会29个省市、自治区就有29种形态。经过份析归纳，可把这29个归纳为以下四个模式。

（一）湖北模式：典型类

这个模式为全国多数省市所具有。它的特点是军方支持的保字号组织垮台，社会造反派取得胜利。胜利后的造反派产生分裂并互斗。其激烈程度各省不同。湖北不算激烈。四川则惨烈异常。直至1968年秋以后毛中央以“清理阶级队伍”为手段把造反派的骨干分子打下去，重建了共产党的权力系统，这种局面才告基本结束。造成造反派互斗的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1）昔日的心结。在1967年初的“一月夺权”中，以各单位的保皇派（亲本单位领导）联合而成的社会上的大群众组织对夺权一般都采取了犹豫乃至反对的态度。因为他们那多年形成的组织观念使之本省市党委是否已属应予夺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持疑问态度。在中央没有定论之前，他们不想贸然造次。而那些由各单位造反派（反本单位领导）联合而成的社会上的大群众组织则投入了“一月夺权”。

但是，在夺权时间、夺权方式、夺权后职位的分配等一系列问题上参与夺权的若干造反派组织间产生分歧。这分歧很快导致分裂。甚至出现一部份造反派组织退出夺权联合体，扬言要再进行一次夺权的混乱局面。

可是，这场闹剧还未到高潮，1967年2月中到3月，几乎全国各省奉毛中央命令“支左”的军方就对夺权的造反派进行了镇压。在镇压行动中军方把最重拳击向夺权行动中最勇悍的或成员中出身成份最差的造反派组织。而对另一些造反派组织的出拳稍轻，或只进行分化瓦解。以湖北为例就是严厉打击“钢工总”，分化“新华工”。

由于那时毛还需要造反派为他的政治清洗火中取栗，遂于1967年4月否决了军方的镇压行动。造反派得以重振旗鼓。但基于一月夺权中的争执和在军方镇压中承受不同的待遇，使两部份造反派心中留下难以抹去的心结蒂芥。

2）组织成份的变化。社会上的保字号组织联合体（如湖北“百万雄师”）垮台后，其许多成员都改换门庭投入到造反派联合体中。在革命不分先后的冠冕旗号、实则扩大本组织声势的真实目的下，造反派对这些成员（个人或整个分部）的加入一概采取欢迎的态度。而那些加入者大都选择了造反派中比较稳健、出身成份政治质量“较好”的一派。这势必会增加两部份造反派组织间的分歧和隔阂。在有些省份这种情况表现得十分尖锐，以至有的造反派组织已嬗变为新保权派，如河南“造总”。

3）共产党省市级官僚和军方派系倾轧的介入。这是造成造反派互斗的最重要原因，而且会使互斗极为剧烈，以至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大量伤亡。这个情况在湖北不严重。令人震惊的情形发生在四川。四川的“产业军”虽然在全国最早（1967年5月）动用枪支对造反派进行屠杀的保字号组织，但它先于湖北“百万雄师”垮台。而它对四川造反派的杀伤，与后来“八·一五”和“反到底”之间，“八·二六”和“红成”之间的惨烈武斗相比就不值一提。（关于这方面较详细的叙述请参阅笔者所编撰的《封杀不了的历史》第409——411页）所造成的巨大伤亡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4）造反意识的差别。由于造反动机的不同，更由于前保字号组织的大量加入，使两派造反派组织在造反意识上分歧日益增大。这突出表现在干部问题上。激进造反派组织总是想尽可

能多地打倒原共产党干部。稳健造反派总是主张尽可能多地解放干部。或许有些激进造反派这样做只是为了让自己争取到更多的职位，但从客观效果上来看，无疑是激进造反派对共产党统治秩序冲击较大。稳健造反派正统“紧跟”，而激进造反派已具有反叛、异端的萌芽。这种情况在河南“造总”与“二·七公社”之间的斗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从以上分析可知，源于1)、3)两种原因造成的造反派内斗是完全负面的。而源于2)、4)两种原因的斗争则包含有积极的思想成份。

(二) 北京、上海模式：发育不全类

北京文革运动以学生为主角，上海以工人为主角。由于北京在毛中央直接注视之下，上海在毛中央最得力的人物张春桥的直接掌控下，使这两个地方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偏离了运动通常的走势。换言之，它们是发育不全的。

1) 社会上的保字号组织——北京的“捍卫团”、上海的工人赤卫队都垮台得早。甚至一度狂飙异常的贵族红卫兵——“联动”，在毛中央的取缔下也终究瓦解。与此同时就是这两地的造反派很早就取得了胜利

造反派得胜几乎是造反派行为中正义因素的终结。这是一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改变的规律。湖北模式的诸省造反派经历了1967年早春镇压的磨难，承受了1967年初夏保字号组织挑起的大武斗的牺牲，这延迟了造反派胜利的到来。也使造反派的历程中多了几分值得一书的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正义内容。也即使湖北模式的诸省造反派的体态显得丰满一些。北京上海造反派没有这些经历，发育不全，体态就显得乾瘪了。也可以说，北京上海的造反派还未发育成熟就夭折了。

2) 北京上海造反派得胜后基本没有发生以剧烈暴力为体现的内斗，(北京清华的团派和“四一四”的激烈斗争主要在校内。中学生“四·三”、“四·四”之间、大学生的“天派”、“地派”之间的分歧还未酿成激烈暴力冲突。上海“工总司”与“上柴联司”的那次武斗若以全国其它地方作参照物也算不了什么。)

暴力倾向较低这当然是好的，但这两地造反派地位的稳定只是说明它们的蜕化。它们在整体上已经失去“被压迫者进行反抗”的性质。非但如此，它们还纳入了毛中央政治清洗的轨道。即它们客观上的作为很早就是在为毛的政治清洗服务。它们对共产党政治秩序的冲击性、反叛性可能在某些基层单位中还会有所体现，但在社会上则表现为重建共产党统治秩序的维护者。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代表人物王洪文本来就不属“反抗类造反者”。在通常情况下，他这类人毫无疑问应成为共产党政治秩序的维护者——保权派。出于政治投机的目的他侧身于造反行列。在“造反”成功后立即走向维护重建共产党政治秩序之途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3) “上柴联司”与上海主流工人组织“工总司”之间的斗争很鲜明地说明了“工总司”的蜕化和文革派别斗争中大量的非理性成份。“上柴联司”的“苦头派”性质界定了它属于“反抗类造反”。也即，它是确实的造反派。可是，由于上柴的“甜头派”上柴“东方红”加入了“工总司”就使“工总司”全力支持“东方红”，打压“上柴联司”，这说明“工总司”并不真实具有民众造反的阶级意识，它的政治取向是谁投效它，它就支持谁的实用主义，而根本妄顾“造反”的原则。否则，它就应该把“东方红”清除，而接纳“联司”。在其它省份，无论是湖北模式的，还是湖南模式、两广模式，这类情况都广泛存在。这充份说明了文革造反运动和民主运动质的差别。

从另一个角度去考察，如果“上柴联司”是由理性清醒的人物领导，它就不应去对抗强大的“工总司”，而着眼于在厂内与“东方红”周旋。可是，在那个充满躁动乃至暴戾的年代，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中充满了非理性的成份。把对方彻底打垮，攫取更大的权力，是坚定不移的目标。极度的意气用事和狂热的企图心又以高调的革命词藻作包装和支撑，以至没有了周旋和折衷妥协的余地。文革中许多你死我活的并不具备积极意义的派别斗争就是这样一发而不可收的。这确实应作为我们民主运动的借鉴。

（三）湖南模式——激进类

湖南文革的形态本可归入湖北模式，即属典型类。但由于湖南“省无联”杰出的活动，似应将其单独来讲。

湖南最原始的保皇派组织是“红色政权保卫军”，直接了当地保湖南省委、长沙市委。该组织在1966年底就彻底垮了。在1967年2—3月的镇反中，湖南军方扶植了名为“红联”的亲军方的群众组织。其骨干成员很多是从前的“红保军”。由此展开了湖南造反派“湘江风雷”、“工联”与“红联”的恶斗。斗的结果与全国多数省市那样是造反派取胜。又如全国多数省市那样，接着又发生造反派中的激进派湘江风雷和正统派“工联”之间的斗争。在其它省市，这类斗争大多以正统派造反派获胜。但湖南不同。湖南在激进造反派“湘江风雷”中分化出了一个更激进的造反派组织——“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

“省无联”思想理念的代表作有杨曦光所撰的“中国向何处去”，张玉纲所撰“我们的纲领”和“省无联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的建议”等。考察“省无联”的理论体系，可作如下几点归纳。

1）“省无联”理念的思想框架仍然在马克思主义之中，其语言词汇也完全是文革式的。这其实很正常。不可以要求人们做出超越时空的创举。在那个时代青少年们能接触到的只能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理论著述。

2）“省无联”所推崇的“巴黎公社原则”实际上已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尽管当时杨曦光们未必意识到这一点。巴黎公社原则的精髓在于民选各级行政长官。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一说，但并没有设计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和结构。把无产阶级专政具体化的是列宁，但那里已根本没有民选行政长官的影子。因而列宁在实际上也否决了恩格斯把巴黎公社誉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

3）巴黎公社原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实则共产党专政、共产党领袖专政的根本颠覆。这是巧谋远虑的毛1967年初就否决了成立上海公社的动议，而决定使用“革命委员会”这个名称的原因。

4）一般造反派反的是旧省市委，这是奉旨造反，尽管在这之中仍有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和冲击共产党政治秩序的成份。这其实是毛搞这场大规模政治清洗所付出的政治代价。而这个代价也在他的预料和承受程度之内。特殊造反派湖南“省无联”反的是毛设计的、钦定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这就构成了“省无联”越轨造反、真实造反的性质。

5）毛在1966年发动民众为其政治清洗火中取栗时，强调要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而在1967年中，他感到政治清洗的目的已基本达到时，就说百分之九十的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都应予以“解放”。在这个时候“省无联”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宣布中国百分之九十的高干都属于“红色资本家阶级”，属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象。这不能不是对毛的极大忤逆。

和挑战。

三十四年前的“省无联”头头们当时究竟有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触犯天条？他们究竟是真的认为自己手中举的确是毛红旗，还是极为技巧地“打着红旗反红期”？如果他们当时知晓自己是在触犯天条他们还敢不敢这样做？这些问号且留予其它人去解答。而我要指出的是：“省无联”的理念是那个时代进步思想的巅峰。是文革人民线索的骄傲。如果没有湖南“省无联”的出现，人民线索的光辉将会减弱许多。

湖南“省无联”理论的出现令中共高层震惊万分。无论是毛的“文革派”还是周恩来的“政府派”都对“省无联”切齿痛恨。他们深知这裹着大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词汇和文革语言而实际上是彻底颠覆共产党统治秩序的“省无联”理论，在当时社会情况下对广大造反派民众极具煽动力、影响力。让这个异端邪说传播开去，后果不堪设想。于是“省无联”仅仅存在了两个月，就遭到中共最高层文革派和政府派的联手镇压。

（四）两广模式：残酷镇压类

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无一不以被镇压为收场，但镇压的时间和力度有所不同。多数在1968年秋至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也有延至1970年的“一打三反”和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或在这几个运动中被反复清算。

镇压的力度有批判、批斗、判刑、枪决。一路能如履薄冰侥幸过关的少数幸运者，也最终没能逃过1976年10月以后的总清算。

然而这一切又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镇压是对个体而言。尽管被镇压、被反复清算的绝大多数都是造反派的成员，因而实际上也就对造反派作了彻底否定，但主持清算工作的军宣队、工宣队、专案组都只说是清查处理混进群众组织里的坏人，而没有说某个造反派组织就是坏组织。

两广的情况大相径庭。虽然两广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没有正式宣布广东的“红旗派”、广西的“四二二”整体为反革命组织，但是两广当局根据康生的一句话宣布两广造反派已被反共救国团控制，从而直接了当地对他们进行整体性摧毁来完成清算镇压。

关于广东的文革，笔者曾撰写了一篇17万字的题为“广东红旗派的兴亡——一部悲壮的反政治迫害的民主斗争史诗”的广州文革简史。

关于广西文革，九十年代初，广西官方曾组织人力撰写了“广西文革大事记”和“广西文革历程”。篇幅均约十几万字。可视为广西文革简史。广西官方愿意修编文革史，而且比较实事求是，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恐怕与韦国清的最终失势有关。

由于有以上著述已对两广文革作了较详细的叙述，故笔者在此只对两广文革的特点作几点简要归纳。

1）两广文革形态与全国其它省市有很大不同。换言之它具有自己的特点。特点之一是两广的派别斗争始终是发生在造反派和保权派之间。

全国各地的原始保皇派一律都垮台，有些省份的继起保守派也垮台。如湖南的“红联”。但是广东的“地总”、“红总”，广西的“联指”这些老资格的原始保权派却不但没有垮台，而且坚

持到最后，取得彻底胜利。

2) 由于两广的原始保权派一直存在，与造反派缠斗，给造反派以极大压力，这是使两广造反派始终没有分裂，没有蜕化的重要原因。

其它省市在保字号组织垮台造反派得胜以后，造反派一律发生不同程度的分裂和蜕化。分裂是指造反派分裂成两派互斗。蜕化是指其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造反性泯灭，变成毛搞政治清洗的工具，或为争夺官位权势而争斗不休。广东红旗派亦曾出现过分裂的迹象。以“工联”、“中大红旗”为代表的“红司”派和以“红旗工人”、“华工红旗”为代表的“三司”派一向有心结。但由于军方的镇压和强大的保权派大军压境，使它们终究团结起来对抗政治迫害。也即，它们始终于某一程度上“保持对现存统治秩序施予的压迫、迫害进行着反抗行动”。两广造反派是全国最纯粹的造反派。它们虽然没有发出湖南“省无联”那样耀眼的光辉，但始终以“反抗类造反动机”为主流。可以说，如果全国的造反派都象两广造反派那样，那么，我们在对文革造反派进行评价时就简单得多了。

3) 两广地区对造反派的镇压十分残酷。而广西又比广东残酷百倍。如前所述，全国大多数地方保字号组织都垮了台。造反派并没有对保权派的骨干成员进行伤害，更不会进行屠杀了。即使是象武汉那样大量杀伤过造反派并终因过于出格（8·20事件）而被毛中央定为“反动组织”的“百万雄师”，得胜的造反派也只是批斗其头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造反派持这样一种理论——保守派的广大群众是自己的阶级兄弟，只是由于受了走资派的蒙蔽才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他们应予教育和团结。

保权派持有与造反派截然不同的理论。他们认为造反派多数出身成份差，是坏人，是阶级敌人。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说造走资派的反，实际上是打击共产党的好干部，是想推翻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因此他们认为对造反派的骨干不是什么教育团结的问题，而是打击和镇压的问题。

广西的镇压比广东严酷得多有两个原因。一是广西是全国唯一第一书记没有垮的省份。“四二二”反第一书记韦国清，“联指”保韦国清。广西从省军区到军分区和县武装部一律支持韦国清，即支持“联指”。而“联指”本身就以武装民兵为骨干组成，所以广西保权派具有强大的镇压能力。反视广东，广东保守派身后没有韦国清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军方的态度也不是那么决绝。

原因之二是与两地民性有关。广西民性比广东强悍得多，桂系将领李宗仁曾驻守广东，他的回忆录中就有这样的说法。广西造反派身处险境，但他们十分勇悍，大规模抢夺枪支弹药与强大的保权派硬拼。被逼急了，甚至连运往越南的军列都敢抢。有说是“压迫愈大，反抗愈大”，其实更可以这样说：反抗愈大，镇压愈大。在韦国清决心要把“四二二”踏平的前提下，“四二二”反抗得愈猛烈也就只会招致愈残酷的镇压。

1968年初夏，毛中央已决定抛弃“四二二”一类造反派组织，遂发布“七三”、“七二四”布告。两广当局以执行布告为由对两广造反派展开了全面的血腥镇压。广东的造反派一压就垮，遂少受些杀伤。广西造反派倔强不屈，就上演了许多“围城”之战。一旦“城破”，任意屠杀，不但击杀抵抗者，还残杀放下武器的俘虏，甚至屠杀伤员俘虏。与此同时，还大规模屠杀“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说他们是造反派的后台和同伙。在杀人的狂潮中还广泛发生惨无人道的吃人兽行。当时有些在西江沿岸被杀害的地富和造反派被就近仍到西江。尸体逐波漂到广州乃至香港。广州市里的杀戮不算剧烈。死人只是两位数。但在许多县份里的恐怖程度完全可以与湖南道县比美。1968年夏广州市已有许多传单和传闻，披露海南岛、肇庆专区、梅

县专区的许多地方大规模屠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把他们的尸体吊在村头，说这就是“黑旗”（广东保权派对造反派——红旗派的蔑称）后台的下场。然后就对造反派民众下手。

三十多年了，由于没有人去对这些情况进行搜集。经历者、目睹者逐渐去世，恐怕许多血淋淋的事实都会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不过，这与在中共几十年的专政统治中死于非命的上千万人来比，又算得什么呢？

六，文革造反派的宿命

1968年1月，从目前流行的十年文革分期来看，这还是文革初期，从我和陈佩华教授等人所持的三年文革分期来看，则是文革中后期。总之，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但中共最高层的文革派和政府派就联手对湖南“省无联”进行了彻底镇压。半年之后，被镇压的噩运落在两广造反派的身上。

如果说湖南“省无联”是因为触犯了“天条”，两广造反派是抗拒原有社会秩序的恢复而遭到镇压，那么，怎么解释湖北模式类的造反派也终难逃肃整的下场呢？这个模式的各省造反派不是得胜并掌了权吗？

这是文革评判中极大的误区。事实是任何模式的造反派都没真正胜利掌权。“响当当”的武汉“钢工总”是如此，赫赫有名的上海“工总司”也是如此，遑论其它省市的造反派了。作为这个事实的另一面，全国各省市的保权派也没有真正失败，即便上海的赤卫队和曾正式被中央定性为保守组织的武汉“百万雄师”也是如此。“胜利”和“失败”都是表象，其内里实质刚好相反，只不过这实质显露出来需要一个过程和相应的时间。

造反派得胜了，它究竟胜了些什么呢？以湖南“省无联”和两广造反派作参照物，它的“胜利”是没有“横死暴毙”而能“寿终正寝”罢了。它是怎么“寿终正寝”的呢？1968年秋，毛决意结束文革混乱局面，稳定重建的共产党统治秩序，他采取了如下步序。1）以军队直接介入镇压两广造反派作样板，警告各地造反派不得再擅自妄为。2）把学生全部分配或军训，城市造反派失去了平民红卫兵这个支柱，立即崩塌。3）宣布各地的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使造反派再没有高保字号组织一头的政治资本。4）强调按系统、单位、车间班组实行大联合。铲平社会上群众组织的山头。5）展开“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五条中，前三条的作用是一目了然。后两条才大有文章。前三条是给造反派吃“镇静剂”，后两条才是对造反派动“手术”。

社会上的造反派联合体通常由各单位的“苦头派”组成。基于各种原因，各个单位里“苦头派”占比例有多有少。然而，即使“苦头”占了多数，一旦要实行按行政单位实行“联合”，“苦头派”也将面临分割和肢解。

“苦头派”的优势和能量在于他们跳出原有的行政格局，结合起来形成力量。在工厂里，多数车间工段班组领导都是“甜头派”的骨干。当“苦头派”拥有行政格局以外的组织群体时，他们可以凭借这一群体力量与“甜头派”抗衡。一旦这个群体解散，各个“苦头派”成员回到车间班组时，他们将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车间班组领导由生产管理权扩展为人身控制权的权威。在多数工厂里都有相当数量没有参加群众组织的“逍遥派”。（“逍遥派”多为没有明显吃过苦头或甜头，或吃过苦头但胆小怕事的人们组成）他们内心大多倾向“苦头派”。但在行政格局之中，他们一定会附和行政领导的态度。“苦头派”马上因势单力薄而迅速瓦解。

社会上造反派的基础是各单位的“苦头派”组织。基础瓦解，它就变成了空中楼阁。尽管在省市革命委员会中有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但它只是摆设，毫无发言权。面对军代表的权

威和复职地方干部的人事网络，群众组织代表唯一能与之抗衡的“武功”是拥有多少万人的组织，可以拉多少万人上街。可是，当组织业已涣散瓦解后，他们就只是革委会里的布偶。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群众组织代表已识时务地脱胎换骨为军代表和地方官僚的附庸。

在废掉了造反派的“武功”后，毛中央便着手对造反派进行“兔死狗烹”。因为这“狗”已不大听话。“烹狗”的具体方法是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从1968年秋全面推开，一直持续到1969年底。它是文革初期“血统论”的大回潮。“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首先把经典“阶级敌人”“黑五类”推上“牺牲台”。贵族红卫兵在1966年8月所干的“红色恐怖”暴行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红色恐怖”运动肆虐了一个多月，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持续了一年多。“红色恐怖”运动由于突然发自一个正常社会，而且时间集中如焦距亮点，故令人们格外震惊和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进行于人们已经看惯了反复无常、暴力虐待乃至血腥屠杀之后，而且在它之后还有更血腥的1970年的“一打三反”，其至死亡伤残人数虽大大超过“红色恐怖”运动，但分散于一年之中，单位时间内的暴行烈度就不及“红色恐怖”运动，故此，在人们对文革的记忆中，“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还排不上恐怖的首位。

在经典阶级敌人被“清理”以后，就轮到“混进群众组织的坏人”了。原工人、职员造反派组织中出身成份黑类的人首当其冲。然后极力在这些组织的骨干头头中罗织罪名，“坏头头”、“黑手”、“阶级异己分子”、“打砸抢分子”等各种新的专政对象的名称都制造出来，扣在他们头上。批斗会上他们被五花大绑，全身被墨汁淋黑，戴上十几斤重的铁帽子或挂上几十斤重的铁牌。在一阵阵吼声中，拳脚交加，许多人就这样当场被打死或留下永久伤残。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领导指挥权在各级“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手中。其手下设立专案组和专司打入的专政队或工人纠察队。毫无疑问，这些“组”或“队”都由原“甜头派”的人充当。而原政工、保卫、武装、人事、党委办公室、工会等机构的干部大多就任其领导人。遇到个别单位被“苦头派”掌了权，“清理”工作不能有效开展时，省市革委会就另派军宣队进驻，并改组其革委会（这就不算“推翻新生红色政权”）。谓之“捅马蜂窝”、“清除运动障碍”。由于某些进入了各级革委会的原造反派的头头能“虚心认错、痛改前非”并能“反戈一击”。也由于革委会还需要有所点缀，在各级革委会中，都有少量原群众组织代表保存下来。这些人中又会有一部份倒于1970年的“一打三反”和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能度过这重重难关达到1976年者为数已十分有限。

1976年10月事变发生，“大限”已到。

文革造反派作为一个社会势力早在1968秋—1969年已被荡平。留在各级革委会中的屈指可数的原造反派群众组织代表早已洗面革心绝对拥护重建的共产党统治秩序。而且，除上海浙江等少数地方外，其他地方的前造反派人物与“四人帮”并无联系，可是，10月事变的胜利者仍然不放过他们。继“王张江姚”被捕后，他们无一不锒铛入狱，甚至连早就与王洪文闹摩擦而被整治了的耿金章和早已离开政治权力圈的蒯大富们都未能逃脱厄运。

这就是文革造反派的下场。从1966年秋他们高喊造反口号那一天起，他们的命运早就被这个制度安排了如斯的宿命。无论他们怎样自我调整自我切削以求适应并融入共产党体制，共产党仍把他们看成自身肌体上的异物，决意把他们清除而后快。因为他们社会地位的窜升是直接起自民间。共产党的政治伦理和秩序只接受由它栽培提拔上来的自己人而不接受这样窜升进来的家世不清质地混杂的人物。并且，他们非但被清除而已，还为自己进了不该进的权力地位之门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被造反派冲击过的共产党干部统统复职了，重握权柄高官厚禄。他们对很多年前造过反的家伙恨之人骨，必欲将其打入十八层地狱而后快。

贵族红卫兵说十年以后见高低实现了。在蒯大富们走入阴森牢门之时，他们进名牌大学校门镀点文化之金，再继而成为第三、第四梯队的重要人选。他们对当年的造反者抛以透心畅快的狞笑。

受过打击的文化人重受当权者的礼遇厚待，感恩戴德之余，他们按着当权者的意图把文革期间所有罪恶都扣到“四人帮”和“四人帮”的所谓“爪牙”造反派的身上。

一切污水都往造反派身上泼，移花接木、指鹿为马、栽赃污陷、力图把造反派从头至尾都涂抹得丑陋不堪十恶不赦。不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它投以鄙弃的目光，连许多民运人士都对它不无歧视，尽管这些民运人士自己可能也正受着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歧视。

七、后记

拖着工余疲惫之躯，总算完成了“论文革时期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民众斗争”和“文革造反运动和造反派之评析”两篇文章。但我心中并未轻松。

我实在弄不懂，中国人，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民族？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执着地写文革、写文革。我不容忍有人歪曲历史，我忘不了政治贱民所受的残害，我抹不去对镇压者的憎恶，我牢牢记住了杰出反抗者的英勇事迹。可是，一场亿万万人参加的运动到头来怎么只有寥寥无几的人在这样写文章？那些当年冲在前列的人们都跑到哪里去了？而我在文革时只是“造反派”里一个普通成员！

中国人，你太健忘。你不但就要忘记“六四”屠杀，而且已经忘记了比“六四”屠杀规模大千万倍的文革大屠杀。

中国人，你太现实。当初你是何等慷慨激昂，事过境迁你竟为优厚的待遇而栖身于那你曾抨击过的阶级，或为经济上的拓展而彻底挥别自己向往过的事业。中国人，你太势利。你不敢正面去谴责当年的施暴者，是因他们和他们的子弟现在握着中国的权柄。你把污水泼向当年的被镇压者，是因为他们现在仍处于任凭践踏的社会底层，并且你可藉此向今天的当权者邀功。

中国人，你太懦弱。对社会恶势力的戕害诬陷你怎么不反抗、不反驳？如果你们的声音在国内被扼制，怎么不另辟途径？

我如此执着地写文革，是因为我不能安于历史的尘埃湮没了闪光的璞玉，不忍目睹罹难者再受不白之冤，不能接受暴戾者还冒充圣贤执掌权柄。但我似乎已预感到自己劳而无功的下场。从1966年到2001年，三十五个春秋逝去。当年三十岁上下的大青年已是老者。二十岁上下的小青年也一把年纪。如果当今中国的当权者还能对言论箝制十年，那么文革史实、文革评判将以一堆伪劣的文字留于后代。但我仍然决意锲而不舍地去对这些伪劣的文字进行洗涂。

我做的作为中国当权者所憎恶，也为某些“高贵者”所侧目。就像我在得知中国人在海内外都被欺侮时写了“不幸的汉民族，我为你哭泣！”而被斥责为“狭隘民族主义”，在得知在9.11后大多数中国人幸灾乐祸时写了“心智昏乱的汉民族，我为你羞耻”又被骂为“汉奸”

那样，许多人会对我如斯评判文革持负面的评价。

但是，如果说我会体认我的其它思想观点，包括钻研多年的社会民主主义会不无纰漏的话，那么我深信我的文革史观一定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果我现在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宣讲我的文革史观，那一定会在当今绝大多数中年以上的蓝领劳工中激起极大的共鸣和反响。若再进一步争取到青年一代的理解，那么就会卷起滔天巨浪，去冲决专制主义的最后城垣，实现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

中国当权者深谙这一对他们性命攸关的奥秘，所以他们绝对要封杀我这一类声音。对此，我没有其它的选择。只能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wx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